

谋  
略  
文  
化  
与  
中  
国

# 智典



冷成金◎编著

隋唐宋元卷

下

千年的智慧巨著的启示



出

编



# 智 典

【隋唐宋元卷】

◎ 冷成金 编著

下



企业管理出版社



## 一言定生死

同一件事情，在不同的人看来，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，在人际关系和政治问题上，尤其如此。智者与愚者，表面上无法分辨，一般情况下也无法分辨，只有到了关键时刻，才会显现出来。

### 【事典】

宋朝的时候，大强盗张海势力十分强大，他将从高邮城经过，高邮城的知军晁仲约再三考虑，觉得自己无法抵御这些强盗，于是，就采取了一个十分精明的措施，晓谕郡中富裕百姓，让其拿出布帛、牛羊、好酒，迎接、犒劳张海。事情传出去，朝廷里文武百官都非常生气，皇帝也十分震怒。富弼提议诛杀晁仲约。范仲淹说：“按郡县的兵力和武器，足以战胜这帮强盗，守住城池。晁仲约遇到了强盗，按理说应当抵御，反而贿赂他，依法当诛。可是现在高邮既没有士兵，又没有武器，况且老百姓都觉得宁愿大家凑集些财物，免于被烧杀抢



范仲淹像

劫。他们对晁仲约的决定肯定是很喜欢的。杀了晁仲约，不符合制定法律的本意。”宋仁宗听后，就放过了晁仲约。富弼十分气愤，他对范仲淹说：“我一要依法行事，你就多方阻挠，今后要我还用什么来整治众人？”范仲淹私下里对他说：“自从本朝开国以来，还未曾轻易诛杀下臣，这是积盛德的事情，你为何要轻易破坏了这一德行？如果以后皇帝杀人杀顺了手，恐怕我们这些

人也性命难保了。”富弼觉得他是在胡说，不以为然。

等到二人出巡视边防，富弼从河北返回京都，到了京城大门，却不准他进去。他无法猜测朝廷的意思，整夜忧虑不安，在床边踱来踱去，不由得感叹道：“范仲淹是个圣人啊！”

狄青是宋代名将，他任枢密使的时候，自恃有功，十分骄横。但他有一个好处，就是非常爱惜士兵，士兵们每次得到军衣、军粮，都说：“这是狄爷爷赏赐给我们的。”朝廷觉得他危害了皇帝威信，对此极为不满。当时，文彦博（封潞国公）执掌国事，他建议派狄青作两镇节度使，让他离开京城。狄青在皇帝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说：“我没有功劳，怎么能接受节度使这一职权呢？我没有犯错误，为什么要把我调到远离京城的地方去呢？”仁宗皇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，就向文潞公转述了狄青的话，并说狄青是个忠臣。

文潞公说：“太祖（赵匡胤）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？但他得了军心，所以才发生了陈桥之变。”仁宗嘴上虽然没说什么，但心里已经同意了他的意见。狄青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，又到中书省去为自己辩解。文彦博直视着他回答说：“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



## 狄青招亲木版画

据《杨家将》中记载，狄青西征误入单于国，与双阳公主成亲，后狄青思念故国，逃回大宋，双阳公主恨其负义，带兵进犯长安。杨宗保出战不胜，只好调来狄青。夫妻二人在阵前相遇，在众人的劝解下言归于好。

朝廷怀疑你罢了。”狄青听了此话，吓得倒退了好几步。

狄青离京作了节度使，朝廷每月两次派遣使者去慰问。狄青一听到宫廷的使者来，就整日惊惧不安，疑心重重。不到半年，他就发病身亡了。这一切是文潞公的计谋啊。

## 【评议】

富弼也算是个不凡之辈了，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，与范仲淹相比，实在是不能相互比较了。这倒不是说范仲淹善于自保，关键是范仲淹能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按照法律的精神办事，符合真正的理想意义上的“法理”，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，至于保全自我，其实只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必然结果。

文彦博也是宋代的著名宰相，但他的作为不仅不能望范仲淹的项背，就是与富弼也无法相比。一语之间，就可决人生死，为大臣者，岂可不慎乎。



图为四川眉山县内的苏轼塑像

## 政坛上的文化巨人

苏轼是诗、词、文、赋、书、画的全能文化巨人，在中国文化史上，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；而在为人方面，他的正直、善良、坚韧，尤其是屡遭贬谪，亦为千古罕见。

苏轼果真是一肚皮的“不合时宜”，新党当权他反对新党，旧党当权他反对旧党；新党上台贬他，旧党上台也贬他。他的一生命运多舛，并非由于他命运不济或是不通世务，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正而且直。

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屠夫乞儿。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！

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伟人苏轼对他的弟弟苏辙说过的一句话，用这句话来描述苏轼的一生，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

在中国历史上，的确充满了阴谋和鲜血，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，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，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。

### 【事典】

在“山不高而秀，水不深而清”的四川眉州，公元1036年（宋仁宗景佑二年），城内苏家



诞生了个婴儿，其父苏洵抱过婴儿，忽见婴儿背上赫然生着一颗黑痣，惊喜地对夫人说：“夫人，你看孩子背上的这颗黑痣，生在正中，犹如太空中的星斗，兆应才华横溢，如江水浩荡，不纳浊流，日后必可成材，充当国家的栋梁。”待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面部，又不禁心头一沉，但见天庭饱满，鼻如悬胆，尤其是一双眼睛，犹如两泓山泉一般，神采飞扬而又清澈见底。苏洵好久才对夫人说：“这孩子性格豪放，锋芒毕露，不通机变，日久必定遭人口舌之诬，一生恐怕多有磨难了。”

这也许是后人附会吧，但无论如何，苏洵的话准确地预见了这个孩子的一生。这个孩子，就是北宋时期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巨人苏轼。

苏轼自幼极其聪敏，不仅博学多才，对于人情世故，也能触类旁通。十一岁时，他应父命作了一篇《黠鼠赋》，极富说明力，兹摘录如下：

苏子夜坐，有鼠方啮，拊床而止之，既止复作，使童子烛之。有囊中空，声在囊中。曰：“嘻！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！”发而视之，寂无所有，举烛而索，中有死鼠。童子惊曰：





苏轼像

商周去不还，盛哉汉唐宋。  
 苏公本天人，谪堕为世用。  
 心空物莫挠，气老笔愈纵。  
 秣糠郊祀歌，远友清庙颂。  
 我生虽后公，妙句得吟讽。  
 整衣拜遗像，千古尊正统。

陆游《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》

“是方啮也，而遽死耶？向何为声，岂为鬼耶？”复出之墮地乃走。虽有敏者，莫措其手。

苏轼叹曰：“异哉，是鼠之黠也！闭于囊中，囊坚而不可穴也。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，不死而死，以求形脱也。吾闻有生莫智于人，拢龙伐蛟，登龟狩麟，役万物而君之，卒见使于一鼠。墮此虫之计中，惊脱兔如处女，恶其为智也。”

坐而假寐，私念其敌，若有告余者，曰：“汝唯多学而识之，望道而未见也。不一于汝，而二余物，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。人能碎千金之壁，而不能无失色于破釜；能缚猛虎，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，此不一之患也。而出于汝而忘之耶！”

予俯而笑，仰而觉。父翌日使作其文，故记之。

从这篇幼年的文章里可以看出，苏轼绝非一个死板迂腐的学究，对于世态人情，乃至从世态人情上引申出深刻的哲理，苏轼是深有所得的。因此，当苏轼踏上官场以后，他不是不懂“为官之道”，而是把官场看得太透，把那些争名逐利之辈看得太透，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心态苏轼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但只有一点，就是苏轼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，只是为国为民着想，为正义着想，而不去屈就阿附。



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  
 相繆鬱乎蒼。此非孟浪  
 之圖於周郎者乎予其破  
 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  
 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釀  
 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 
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  
 子俱懷於江清之上侶矣  
 飄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  
 舟舉匏鐃以相屬寄情  
 睥睨天地渺浮海之一粟  
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 
 無窮挾飛仙以遨游抱

苏轼赤壁赋（局部）

在全国选拔进士的会考中，苏轼以《刑赏忠厚之至》论的论文获得了欧阳修等主考官的高度赞赏，在这篇文章里，他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爱民之心，并言辞铿锵，文气充沛，尤其是能不拘古法，活用典故，更使审卷官们惊喜不已。欧阳修见卷子独占鳌头，便想评为第一，但又怕这卷子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，评为第一会被人猜说，就判为第二，等开了封卷，才知是苏轼的试卷。在礼部进行的口试复试中，苏轼以《春秋对义》获第一名。

后来，欧阳修在读苏轼的感谢信时，十分感慨地说：“捧读苏轼的信，我全身喜极汗流，快活呀快活！此人是当今奇才，我应当回避，放他出人头地。请大家记住我的话：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！”当时，欧阳修文名满天下，天下士子的进退之权也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，欧阳修这么一句话，苏轼之名顷刻间传遍全国。“出人头地”这一成语，也就是从这里来的。

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，苏轼在公元1069年（熙宁二年）又回到了开封，仍“入直史馆”供职。在神宗的支持下，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，这样，在朝廷之上，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。

旧党是反对变法的，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，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重的元老名臣，还是一位大学者，重要的史学著作



《资治通鉴》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。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，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，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、诗人。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，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，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，如谢景温、吕惠卿、舒亶、曾布、章惇等人都被提拔上来。王安石的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，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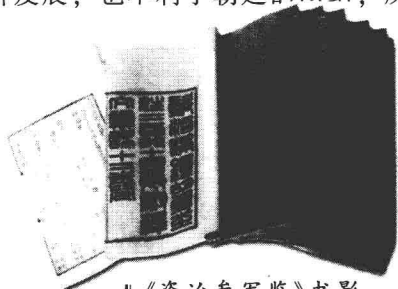


|| 司马光像

对他自己来说，既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，又使他个人遭受这帮小人的陷害。

对于这“两党”，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，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，关系很好；对王安石，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，也能推心置腹，无话不谈，因此，在这两派势力之间，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。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，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，说出违心之论。

在神宗的支持下，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，气势很盛，在经济、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，推行新法。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，都有许多不妥之处，不利于社会安定、经济发展，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，所以，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。对于王安石废科举、兴学校的改革措施，尤为不满，他上书神宗说：“选拔人才的方法，在于了解人才；而了解人才的方法，在于能考



|| 《资治通鉴》书影



察人才的实际情况，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。……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，大的事情，不要贪图改变旧法，标新立异，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。”神宗听了苏轼的话，觉得有一定的道理，便又召苏轼询问说：“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？即便是我的过失，也请你指出来。”苏轼说：“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，可以说是天纵文武，不怕遇事不理解；不怕不勤恳，不怕做事没有决断，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，办事太急，太容易听别人的话，提拔官员太快。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沉稳的态度，等待人、事之来，然后再慎重处理。”

神宗听了，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，就接受了他的建议，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、设学馆等新法。

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，非常高兴，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，对苏轼大加称赞。当不久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，司马光着急了，他紧急搜罗帮手，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。

一天，司马光找到苏轼，未经试探，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：“王安石敢自行其事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实在是胆大妄为，我们要联合起来，一起讨伐他！”苏轼笑笑说：“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？”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，十分高兴，紧接着追问说：“那么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”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：“王安石改革时弊，欲行新法，也是为国为民着想，是为公不为私，从大局来看，有值得称道之处。但其新法，确有祸国殃民之害，我才加以反对。至于你那‘祖宗之法不可变’的信条，比起王安石的新法，更是误国害民之根！”

司马光听了，勃然大怒，高声骂道：“好个介甫（王安石之字）之党！”拂袖而去。从此，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。

苏轼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，在两月之内，写了《上神宗皇帝书》、《再上皇帝书》，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，引起了朝野的



震动。苏轼把这种改革，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，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，而是在背后强劲地打马，危险之至，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，喂马蓄锐，天明再行。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，可谓恨得咬牙切齿。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，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准备整治苏轼。

一天，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，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“深谈”。王安石怒责苏轼说：“你站在司马光一边，指斥新法，是何居心？”苏轼一听，火往上冒，反问道：“你这话从何说起？”王安石说：“仁宗在时，你主张改革时弊，反对因循守旧，是何等坚决，现在我行新法，你为什么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？”苏轼怒道：“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，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？你不审时度势，反倒急功好利，冒然推行新法，必遭天下人之拒。”就这样，两人的谈话破裂了。

不久，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，说他扶丧返川时，利用官船贩运私盐。后虽经查无此事，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。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。这时，新党正想排斥异己，就把他贬到了杭州，任杭州通判。

苏轼在杭州、徐州辗转数年，兴水利，救水灾，为民做了许多好事。公元1079年（元丰二年），苏轼又从徐州迁至湖州。这时，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。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，勾





心斗角，相互倾轧。熙宁八年二月，王安石被神宗复用，任他为宰相，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，为了当宰相，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。吕惠卿本是靠阿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，因而，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，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，有的用了“无使上知”的字样，神宗一见，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，十分恼怒，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，命其永远不得返朝。这样一来，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“新进勇锐”之人吕惠卿、李定、舒亶等人就独霸了朝权。

苏轼到达湖州，按惯例要写谢表，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，不禁气愤，他在表中不由地写道：“知其愚不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”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，不由大喜，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，立即串连了舒亶等人，准备“劾奏”苏轼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

但是，苏轼文名布于天下，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，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，要想参倒苏轼，也不是很容易的事。但李定、舒亶等人唯恐苏轼东山再起，将来难以处治，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。

第二天早上，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，首先弹劾道：“苏轼说‘知其愚不时，难以追陪新进’，既是反对新法，也是对皇上不



王安石塑像。王安石一生穷其心血，实行变法，想使北宋富强，却因用人不当和操之过急招致众人的不满，在守旧派的反击下，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。



### || 苏东坡纪念馆

满；说‘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’，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，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。”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“可废之罪”：一是“怙终不悔，其恶已著”；二是“傲悖之语，日闻中外”；三是“言伪而辩”，“行伪而坚”；四是皇上“修明政事，怨已不用”。

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，果然脸色不愉，再加李定煽风点火，果然有些怒气了，舒亶见火候已到，便趁机举出“确凿证据”，说苏轼存心险恶。

舒亶说：“苏轼反对新法，证据确凿，对每一种法令，他几乎都作诗诽谤。他包藏祸心，怨恨皇上，无人臣之节，确属事实。陛下发钱已业民，苏轼就说‘赢得儿童语音好，一年强半在城中’；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，他就说‘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终无术’；陛下严禁私盐，他就说‘岂是闻韶解忘味，尔来三月食无盐’。望陛下明察。”

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恶毒，苏轼的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诽谤之意，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产生的一些现象，但在舒亶的嘴里，都成了恶毒的攻击，在此情此景之下，谁又能说得清楚



|| 李白诗·苏轼书

呢？果然，在犹豫了一阵之后，神宗还是下令把苏轼拿问。

苏轼被在湖州任上被逮捕，押出湖州时，百姓争相送，失声痛哭，足见苏轼之得民心。押到开封以后，投于乌台狱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之一——“乌台诗案”。

苏轼在狱中呆了很长时间，苏轼的儿子求告无门，便去南京找苏轼的弟弟苏辙想办法，临行之时，他嘱咐别人，送饭时送鱼，不要送肉，但送饭的人搞混了，竟把肉送了进去，苏轼一见，误以为大限将到，不由得悲愤中生。原因是苏轼与儿子约好，如果没有什么情况，送饭时带鱼，如果情况紧急，送饭时带肉，这样可以内外通气，早作准备。苏轼自觉李定、舒亶等人必欲将他处死，在悲愤之中，索笔写下了两首诗，其一云：

圣上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忘身。  
百年未满足偿债，十口无家更累人。  
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，  
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人间未了因。

苏轼的这首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，本想托一狱卒交给弟弟，没想到被李定安排的耳目看到，一把抢去，交给李定。李定以为苏轼又在写诗怨谤，正愁拿不到证据，便把诗稿往袖中一塞，匆匆上朝去了。





这时，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，曹太后在弥留之际，给神宗谈过一次话，指出苏轼是个忠臣、才子、廉吏、好人，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；神宗虽然年轻气盛，但也并未想杀苏轼，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陷害，企图置之于死地。第二天上朝，李定竟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，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，神宗看完诗，觉得莫名其妙，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，李定一惊，才想起自己害人切，竟未看诗稿。这么一来，形势急转直下，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，都见风使舵，替苏轼说情。就这样，在审无证据的情况下，苏轼被释放出狱。



|| 苏轼之弟苏辙像

对于“乌台诗案”，还有另一种解释。宋代谏议大夫刘安世（另号元城先生）在《元城先生语录》中有一段记载：苏东坡被御史谢景温诬告乃至下狱。当时张安道在南京做官，就向皇帝上疏营救他。本想附在南京府的公文中递交皇上，府官不敢接受。于是张安道就命令他的儿子张恕到登闻鼓院将信投进去，张恕左思右想，觉得有些不妥，徘徊再三，终于未敢投书。不久，东坡出了狱，后来看见那封上疏的副本，不由得伸出舌头，脸色都变了。有人问他为何如此，东坡未回答。后来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看了那副本，说：“我哥哥当然要吐舌头了！这件事全靠张恕之力。”别人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子由说：“难道不知道汉代郑昌救盍宽饶的事吗？郑昌上书说：“上无许、史之属，下无金张之托，这话正激起汉宣帝的愤怒。宽饶有什么罪过呢？正是因为触犯了许、史之辈而遭祸。再来发人隐私，就更添加了几分怒气。如今东坡也没有罪，不过是名气